

· “自由意志” 专栏 ·

【编者按】在人类思想上，不同文化对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应当存在一直存在着争议。它关联于必然性与可能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信仰与自由、人性与超人性、自主性与道德责任等问题。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它历经基督教思想、中世纪经院哲学及近代世俗化哲学不同阐释。其内涵不断演变，其核心要素在现代西方法律、道德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厘清该概念在哲学史上的流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古与今（进而为理解其他生活方式提供参照），理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理解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我刊发起的“哲学研究年度学术”会议，意在汇聚学界力量，培育与发掘最有生长力的学术话题，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不竭动力。我们主张，学术研究与学术办刊都要公开化、竞争化与透明化。通过中国学术同行的切磋琢磨，玉成宝器，激荡灵感，升华视域。

我们将“自由意志”确定为我刊2018年度学术会议的主题。我们事先选定了黄裕生、聂敏里两位作者的相关文章，将其作为靶子论文提交相关评议人。各评议人历经数月，认真撰写并提交了商榷文章。2018金秋时节，我们邀约三五同行共聚羊城，就该话题进行了酣畅讨论。江璐通过绵密细致的文献考证与义理分析，指出意志概念含义古今有别。吕超将康德式建构论与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视角进行了结合，拓展了伦理问题的存在论式解读之面向。苏德超则从自然主义的因果论立场出发，讨论了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的可能性。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过脑之作，每一段分析都有步步进逼之紧张。数月前的现场竞技之热烈，倏忽间已跃然纸上。

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

——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江 璐

【摘要】本文审视了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基本观点，即古希腊意志概念的缺席、康德意志概念的优越性、行为之道德属性应归责于意志以及赖尔对意志概念的消解之无效性，并对其各自做了回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 and 考量，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一）与狄勒“古希腊无意志”一说中所发现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概念，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Willkür）概念，而非其意志（Wille）概念——康德将道德的善恶归责于自由抉择，而非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二）康德也认识到了赖尔所批评的身心间因果作用的问题，而重视赖尔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德将意志限制到道德领域的做法。

【关键词】自由意志 道德 康德 亚里士多德 赖尔 [中图分类号] B82-02

一、古希腊有无“意志”概念之争

聂敏里的文章《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分别涉及到了当今古希腊哲学界以及分析哲学界中关于意志的两个核心问题：（一）古希腊哲学中是否有“意志”这一概念的问题；（二）意志的概念是否具有必要性的问题。在此，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意志与行为归责问题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的源起是狄勒（A. Dihle）1974年在伯克利所做的萨瑟（Sather）系列讲座，此讲座的讲稿于1982年以《古典时代的意志理论》（*The Theory of Will in Classical Antiquity*）为题编辑出版。其中狄勒提出了一个有别于罗斯（W. D. Ross）等较早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者的观点，即古希腊哲学中缺乏意志的概念，从而也没有关于意志的理论。狄勒认为古希腊哲学中所缺席的是一种与理智和情感都相区分的意志的概念（cf. Dihle, p. 20），这种意义上的意志的概念是奥古斯丁发明的，后者的心理学中，意志独立于认知，然而认知活动本身，包括人的一切其他有意识的活动，例如看（vision）等，都包含着一种由意志所发起的意向性。（ibid., p. 125）对此观点，1997/1998年弗雷德（M. Frede）以他同样在伯克利所做的萨瑟系列讲座给予了回应。弗雷德的讲座稿在他身后由朗格（A. A. Long）以《自由意志：该观念在古代思想中的起源》（*A Free Will: Origins of the Notion in Ancient Thought*）为题编辑出版。针对狄勒之古希腊无意志概念的著名断言，弗雷德认为，古希腊哲学中并非就完全没有与意志相关的思想，古希腊人（包括亚里士多德）都有着行为之自愿性的认识，（cf. Frede, p. 3）这种关于自愿行为的思想，被弗雷德称之为“日常的关于意志的思想”。（ibid., p. 4）但是，在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中，类似意志的思想仅仅涉及到意愿活动，也就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去做某事，可以归责给意愿活动的也就仅仅是选择和决定。然而从斯多亚开始，意志的概念变得更加复杂了，它不仅涉及实践领域，也涉及到认知领域，例如像 $2+2=4$ 的这种心灵印象，意志不仅与选择相关，同时也与信念相关。在弗雷德看来，奥古斯丁的意志概念来自于斯多亚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cf. ibid., pp. 157-158）

聂敏里显然同意狄勒的看法，他在文中引用了狄勒的一段话“实际行动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非理性力量中取得的能力。它们可以被做计划的理智所释放和指引，后者以此方式产生了它自己的 $\thetaυμός$ 。……根本不需要一个居间的意志，行动可以直接依赖于它，对人的行为的任何道德判断可以最终诉诸于它。道德判断首要关涉的是体现在人的行为中的理智实现。”（聂敏里，第80页；cf. Dihle, p. 27）聂敏里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灵魂具有一个无逻各斯的部分和一个有逻各斯的部分的二分说（*NE I, 13*）和关于自愿和不自愿的讨论（*NE III, 1*）的审视和探讨，补充性地肯定了狄勒的结论。他特别审视了亚氏关于自愿和不自愿行为与归责问题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愿的（ $\epsilonκούσιον$ ）行为是行为人所需负责的，因为自愿的感情和实践会受到称赞或谴责。（参见亚里士多德，第61页）而通过分析，聂敏里得出结论认为，在亚氏那里，为自愿行为负责的是理性和欲望，而非意志。（参见聂敏里，第83页）至此，读者将会浮现出一个问题，即为何要使得意志成为归责的主体？如果实践理性，即灵魂之考虑和推理的部分（ $\lambdaογιστικόν$ ）和欲求（ $\deltaρξις$ ）为作为行动者的人之内在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为何还要引入一个第三者呢？聂敏里在接近文末之处给出了理由，即只有归责到意志之上，行动才具有真实意义上的道德性。（同上，第90-91页）最终，他肯定了康德的意志的概念，认为他的义务伦理学相对古希腊的幸福伦理学而言是哲学史发展上的一个进步。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到当今心灵哲学中的一个争论，特别是吉尔伯特·赖尔（G. Ryle）在他的名著《心之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中所提出来的对传统意志概念的质疑和批判。聂敏里一方面同

意赖尔从意志概念出发的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并赞成他否认有意志这么一种心灵官能的想法，另一方面，聂敏里认为赖尔的批判并不足以从哲学中消解意志概念，因为后者主要是在道德和法权的意义上得到使用，而赖尔却仅仅是消解了心灵哲学意义上的意志。

聂敏里针对这两个问题所提出的见解非常清晰明了，他以细致的亚氏文本分析为基础的论述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否就可由此得以定论了呢？笔者认为尚有进一步思索、区分和质疑的余地。毕竟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是贯穿哲学史的难题，需要多方位的考察和审视，聂文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针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还需进一步确定狄勒所想要指出的“缺席”的意志之具体内涵。科尔万（C. Kirwan）在他对狄勒此书的书评中写到，狄勒所要找的意志是一种选择的能力，是一种服从或反对命令的能力，他进而问到，这一种意志概念是否是一个好的解释工具呢？它是否是在此意义上被奥古斯丁以及他后来的哲学家所用呢？（cf. Kirwan, pp. 335 - 336）顺着他的问题，笔者在此想提问的是，既然聂敏里将康德的意志概念用来对照古希腊哲学中意志的缺席，那么，康德的意志概念是否是狄勒书中所诊断出来的那种缺席的意志呢？是否的确只有归责到意志上，才使得行为具有道德性呢？笔者认为就此还需要更加分化和仔细地讨论。文中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展开性的讨论。而本文的第二部分则对哲学史中的意志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了聂敏里对赖尔的批评，这一节是第三节的内容的铺垫。

二、对“意志”概念的内容分析

在哲学史以及当代哲学有关自由意志的讨论中，道德的层面并不一定总是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凯恩（R. Kane）指出，自由意志的问题首先是在有关宿命论（determinism）的争论中产生的。（cf. Kane, p. 6）尽管它与人的行动相关，但是并非都是道德领域的行为，例如行走或坐下这些发自行动者本身的行为（ἐφ' ἡμῖν），就属于自由意志与宿命论争论中所讨论的对象。近代哲学的意志概念是中世纪哲学中意志概念的延续和发展，意志被视为是考虑的能力，然而近代哲学家如洛克不再将其视为一种官能。中世纪哲学家们将意志视为是人灵魂之理性部分所引发欲求行动的机制，而近代的哲学家们逐渐放弃了这个思想。在霍布斯和笛卡尔那里，意志变成了发起身体运动的原因。在一些近代哲学家那里，托马斯·阿奎那的关于意志为一种求善的能力的理解也仍然留存。（cf. Yrjönsuuri, pp. 581 - 584）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批评了将心灵划分为思想、情感、意志的这种做法，特别是那种认为有着一种非质料的叫做意志的官能，且有着其相对应的意志活动的看法。（cf. Ryle, pp. 61 - 62）

针对赖尔对传统的意志概念的批评，聂敏里首先认同意志并非首要的是一种官能的这种看法。但他认为，赖尔对意志概念的理解不够充分，从而导致了像他那样的自然主义者将意志概念排除在道德心理学之外。而聂敏里对意志的理解是“意志和与意志相关的行为所体现的恰恰不是人的行为的一种自然倾向，而是一种与人的自然冲动相对抗的行为倾向。从而，出自意志的行为往往是一种需要通过巨大的努力和克制才能完成的行为。”（聂敏里，第86页）他以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为依据，将人的行为区分为出自自然冲动、欲望和理性的行为和出自自由意志的主体行为。在此，“意志是行为的道德前提。一个行为只有是出自意志的，才是道德或不道德的。所以，意志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同上）“意志概念更多地是从行动的责任主体的角度来讲的，只是由于我们成为我们行动的原因，从而，我们才需要为我们的行动负责，而为我们的行动提供这个原因并承担这种责任的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我们的意志，它在政治的、法的意义上同时也就是权利主体自身。所以意志概念首先是一个政治学的、社会学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同上）聂敏里批评赖尔“完全忽略了

意志概念的政治学、社会学的语境，从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到意志概念的历史起源。”（聂敏里，第 86 页）

聂敏里的这一看法显然是康德式的。康德在对意志（Wille）和自由抉择（Willkür，李秋零译为“任性”，张荣将其称为“决断”）加以区分的同时，避免了将意志视为一种官能的做法。（cf. Caygill, p. 415）同时在康德那里，一个行为的道德性在于它是否是为了道德律而发生的。（参见康德，2003 年，第 98 页）而如同聂敏里所提到的那样，康德的意志概念的确也包含着政治、社会的层面，因为它同时为道德、政治与宗教的规范和价值之根源。（cf. Yovel, p. 267）而赖尔很明显并不关注这些内容。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使用康德似乎的确可以反驳赖尔对传统的意志概念的批判和解构。

但或许赖尔与康德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并没有这么强烈。首先，赖尔和康德关于意志的讨论至少在一个方面还是有着共同点的，即意志之因果性问题。这与行动之归责问题也相关联。赖尔反对预设一种叫做意志的官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设想在人的具体行动之前有着触发此行动的意志活动（volition）是不合理的。他的论据部分是由日常语言的使用出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刻意地去描述自己的意志活动，另外，他人的意志活动也从未被见证过。而另几个论据则涉及到身心之间的因果关系。赖尔解释道，如接受心灵与身体之间有着一种因果关联的话，那这与认为心灵处在物质世界之因果链之外的信念相冲突。而他所提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论据则问道意志活动本身是否是自愿的。（cf. Ryle, pp. 63 - 67）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他的第三个论据，也就是身心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实际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谈论过这个问题，他指出，人同时是现象的人（*homo phaenomenon*），也是本体的人（*homo noumenon*），他通过感官知道自然，也通过单纯的统觉来认识自身，后一种情况是在“他根本不能归于感官印象的那些行动和内部规定中认识自己”（康德，2004 年，第 442 页），就他的某些能力而言，他是一个单纯理知的对象。这种能力被称作知性和理性，尤其是后者，它是“完全真正地、卓越地与一切经验性的力量区分开来的”。此理性则具有原因性，“这一点从我们在一切实践的事情中作为规则而加在实行的力量之上的那些命令中就看得很清楚。”（同上）这种因果性体现在应然性中：自然中的必然性与实践领域的应当之必然是有着区分的，应当表达了一种可能的行为，这行为的根据是单纯的概念，而非是像一个单纯的自然活动那样以现象为根据。而当“这个应当被指向这种行动时，这种行动当然就必须在自然条件之下才是可能的；但这些自然条件不涉及任意本身的规定”。（康德，2004 年，第 442 - 443 页）康德同时也意识到赖尔描绘过的身心之间无法合法地确定因果性关系的问题。赖尔主要批评的对象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后者认为人的心灵通过松果腺可以触发人身体的行动。而康德在将自由定义为意志之就其理性而言的、那种因果性的“在能够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时的那种属性”（康德，2013 年，第 69 页）。这种因果性的作用是内在（immanent）于理知世界的，而并不是逾越性（transzendent）地作用到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上。在一个纯粹的理知世界中，可以将理性设想为可能的作用因，即规定意志的原因。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属于理知世界，他只有在按自由的准则行动的时候，才能作为成员属于理知世界的目的王国。（参见同上，第 87 - 88 页）

简言之，康德意识到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所蕴含的问题，从而将意志之因果性限制在了理知领域。从而他不再使用意志概念来解释人作为感性人的行动，例如行走等，他把这一切活动都置在感性世界的自然的必然性之下。而人作为理知世界的成员，处在应然之必然性之下，而与自然之必然性不同，应然之必然性发源于意志之符合道德律的自我规定。意志的因果性在于人之理性行动中所依据的准则发源于意志的规定，这是纯粹在一个规范性的层面上来讨论的。从而归责可以放在法权层面上来讨论，却无法以传统的某种行动出自于某人，即古希腊的“ἐφ’ ἡμῖν”的模式来讨论。在《道德形而上

学》中，康德将道德意义上的归责 (*imputatio*) 定义为“使某人被视为一个后来叫做行为并受法则支配的行动之事主的判断”，也就是将某人视为某个行为的自由因 (*causa libera*)。(康德，2013年，第25页)

从而可见，赖尔所批判的意志概念并非是康德哲学中的意志概念，而是中世纪传统中的那种意志概念，而康德的意志概念的内涵已经随着近代哲学中对意志的新的认识而得以转化。从中世纪的传统出发再来审视赖尔的初衷也就顺理成章了：他想批判和解构的是那种延续奥古斯丁传统的有着独特的心灵活动的官能，而这种心灵活动覆盖面广于道德行动。而康德则通过将意志视为一种自律能力而将其限制到了道德领域。

三、康德哲学中的意志 (Wille) 和自由抉择 (Willkür)

那么，狄勒认为古希腊所缺席的意志概念到底是何种概念呢？按上文中科尔万的概括，作为一种服从或不服从法则的能力，狄勒眼中的意志概念有别于赖尔所批判的意志概念，而看似与康德的自己给自己立法的意志更加接近。但在此仍需要小心且仔细地探讨的是是否可以将其与康德的意志概念相等同。答案看来是否定的。首先，康德将意志等同于实践理性，意志在他这里并非是一种“居间者”。其次，康德的意志有着多层意义内涵，并且与自由抉择相区分。如果说康德的意志首先是一种自律的、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能力，那么服从或不服从法则的能力就应该与其相区分。狄勒所想的意志概念实际上应该更加贴近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抉择概念。

自从赖因霍尔德 (K. L. Reinhold) 以来，就一直有人认为在康德关于自由的学说中存在着矛盾和不自洽的地方。因为一方面康德说到只有善的意志才是自由的意志 (GMS AA IV: 447)，而另一方面，他又说到恶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cf. Bojanowski, p. 207) 例如康德在《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解释到，恶同样发源于自由，而非由感性的倾向所导致。基督教背景下关于恶之根源的讨论主要来自奥古斯丁的《论自由意志》，其中谈到了意志可以选择善或恶，而意志的选择则构成了罪恶或善事。(参见奥古斯丁，第100页) 选择恶是一种对善的秩序的颠倒。(同上，第136页) 这一思想在康德那里同样可以找到，在康德看来，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恶，此时，我们颠倒了意志本身内在所拥有的结构，违反义务而行之，这种颠倒属于人所拥有的自由抉择的能力。(cf. Yovel, p. 281) 可见，恶行之归责的基础，更加确切地说不在于意志，而在于道德心理学中的另一个机能，即自由抉择的能力。艾利森 (H. Allison) 写到，意志是一种立法能力，而自由抉择则是一种执行能力。(cf. Allison, p. 129) 在《道德形而上学》(MS 6: 213-214) 中可以见到，法权是建基在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之自由抉择之上的，因为它被定义为“一个人的自由抉择 (原译文做“任性”) 能够在其下按照一个普遍的自由法则与另一方的自由抉择保持一致的那种条件的总和”。(康德，2013年，第28页) 艾利森同时也解释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以自由抉择的含义来讨论“自由”，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他所关注的是意志的自由，后者指的更多的是自发性、自律，也就是自己规定自己的能力。(cf. Allison, p. 131) 实际上，对康德来说，真正意义上自由的，其实是自由抉择，这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MS AA VI: 226) 以及未发表的《预备工作》(Vorarbeiten) 中有着明确说明。从而贝克 (L. W. Beck) 认为，康德的意志之主要特征为自律 (autonomy)，而自由抉择之特征则为自发性 (spontaneity)。(cf. Allison, pp. 131-132) 自由抉择中的自由有着一层特殊的含义，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解释到，自由抉择中的自由“不能通过遵循或者违背法则来行动的选择能力来界定”，尽管人作为感性存在者的确也表现出一种违背法则做出选择的能力，然而得以界定其作为理知存在者自由的，却仍然是它能够依照道德律来选择准则的能

力。在这里，他把恶，也就是背离立法的可能性视为一种无能，而非一种能力。（参见康德，2013年，第24-25页）这里的叙述表面看来似乎与《纯粹理性限度里的宗教》中关于自由的论述相冲突，细看则不然，因为人是有能力依照道德律来加以选择的，感性不足以迫使人违背道德律。从而，无能来自于人自由的失误。尽管他使用了“绝对的恶”（das radikale Böse）一词，康德的人性观是乐观的，这符合启蒙的思潮。在他看来，背离立法的选择并不会使得我们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失去认知道德律的能力，恶的根源不可被放置在道德上立法的理性之败坏之中，因为后者是不可能被败坏的。（AA VI: 35; cf. Kontos, p. 5）

康德将行为之道德属性归咎于自由意志的抉择之上的做法，是对来自奥古斯丁传统的延续。在奥古斯丁所处的基督教语境之下，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奥古斯丁必需将行为所带来的恶归咎到人的自由意志之上，从而回答“恶从何来”的这一神义论问题。在康德启蒙的语境之下，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从而行为的道德属性则可追溯到自由抉择是否服从实践理性之道德律之上。然而这并不说明行为只有在有着选择善恶的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才会具有道德属性。毕竟，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获得赞颂或谴责的。从而，科尔斯戈尔德（C. Korsgaard）认为，康德与亚里士多德就道德属性的分歧在于，亚里士多德将理性的沉思活动视为价值的来源，而康德则将善的意志（der gute Wille）视为价值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沉思是一种纯粹的实现，它作为最高善使得道德行为获得其合法性，而康德的善的意志本身即为至高善，所有善的选择和行动都是通过受到了善的意志的规定而得以成为善的。（cf. Korsgaard, pp. 498-499）诚然，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与康德的规范伦理学有着很大的区分。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亚里士多德，第50页），它使得人能够在过度和不足之间找到并选取当中的中道。从而，自由抉择也并非完全在亚氏那里缺席，真正缺席的应该是在笛卡尔意义上的那种超出了道德领域的意志活动。并且，恶同样可以是自愿的，从而可归咎到行动者这个主体。（参见同上，第81页）亚里士多德将应受谴责的行为归咎于不自制或无知，这同样是在人之选择能力中的，例如他说醉酒的人也要为他因醉酒的无知而导致的恶行承担责任，因为他“本可以不喝醉的”（亚里士多德，第78页），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保持清醒。这样看来，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对道德行为之归责的看法并非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么不同。^①

四、总结

聂敏里的文章将哲学史研究和当代哲学中的基础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指出康德之意志概念在道德哲学和法权哲学中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本文则以此为基础，对文中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加以探讨。本文想指出的是，赖尔与康德或许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分别针对近代哲学中的身心关系问题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赖尔的讨论是在心灵哲学的视域之下，而康德则选择避开了身心关系的问题而将同一问题局限到道德领域，将其转化成了一种规范性的问题。了解赖尔的批评所针对的对象，更会增进对康德关于意志之讨论的理解。而狄勒所认为在古希腊缺席的意志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于康德的意志概念，而更加贴近后者的自由抉择概念。通过对康德的意志概念和其自由抉择概念的分析，本文还指出，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像康德那样明确指出了自由抉择的能力，却同样认为行动者主体的选择导致了行为的道德属性（是该受赞誉还是该受谴责）。如果说，康德的自由抉择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奥古斯丁传统中意志概念内容中的某些要素，那么在此还可以提一个问题，即自由抉择所

^① 早在1974年，沙利文（R. Sullivan）就已令人信服地指出康德本人对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误解。（cf. Sullivan, pp. 24-53）

做的选择准则的活动，是否属于赖尔所批评过的意志活动？如果仍将其视为一种规范性的考量、而非心灵活动，那就应该有更多的细节来阐述康德哲学中意志与自由抉择间的关系，这是笔者将来要进一步做的工作。

参考文献

- 奥古斯丁, 2010年《论自由意志》, 成官泯译, 上海世纪出版社。
- 康德, 2003年《实践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人民出版社。
- 2004年《纯粹理性批判》, 邓晓芒译, 人民出版社。
- 2013年《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李秋零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聂敏里, 2018年《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载《哲学研究》第12期。
- 亚里士多德, 2003年《尼各马可伦理学》, 廖申白译注, 商务印书馆。
- Allison, H., 1990, *Kant's Theory of Free Wil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janowski, J., 2007,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Zurechenbarkeit",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61 (2).
- Dihle, A., 1982, *The Theory of Will in Classical Antiquity*,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ygill, H., 1995, *A Kant Dictionary*, Oxford: Blackwell.
- Frede, M., 2011, *Free Will: Origins of a Notion in Ancient Thought*, ed. by A. A. Long,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ane, R., 2002,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Contemporary Free Will Debates", in *Oxford Handbook of Free Will*, ed. by R. Ka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rwan, C., 1984, "Albrecht Dihle: The Theory of Will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n *The Classical Review* 34 (2).
- Kontos, P., 2018, "Introduction", in *Evil in Aristotle*, ed. by P. Kont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rsgaard, C., 1986, "Aristotle and Kant on the Source of Value", in *Ethics* 96 (3).
- Ryle, G., 2000,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Penguin Books.
- Sullivan, R., 1974, "The Kantian Critique of Aristotle's Moral Philosophy: an Appraisal", in *Review of Metaphysics* 28 (1).
- Yovel, Y., 1998, "Kant's Practical Reason as Will, Interest, Recognition, Judgment and Choice", in *Review of Metaphysics* 52.
- Yrjönsuuri, M., 2014, "Will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in *Source Book for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ed. by S. Knuuttila & J. Sihvola, Dordrecht: Springer.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刘未沫

**Form-name , Sound-name and Taste-name:
The Evolution of *Ming* (Name) in Chinese Classical Thought**

Gong Huanan

The *Xingming* school of the pre-Qin period consciously used form (*xing*) as the basis of name (*ming*). Confucian and Daoist at that time cared more about “what is transcendent” (*xing er shang*) than merely about form and name. In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made the name auditory, while proposed sobriquets (*hao*) and used sound as the basis of name, and expressed meaning (*yi*) and mind (*xin*) using sound (*sheng*) and speech (*yan*). These themes transformed the debate over name vs. actuality to one over the discrimination of speech vs. meaning. The Mysterious Learning (*xuan xu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questio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 and meaning and sound and speech, and distinguished between name and sobriquet and reference (*cheng*) and appellation (*wei*), thus surpassed the sound-name (*sheng ming*) and dispelling the discrimination of speech vs. meaning, classified and named things on the basis of taste. From form to sound and then to taste constitutes a complete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ming, and also reflects the basic trend of naming and classifica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ideas.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 Commentary on Prof. Nie’s Article
“The Absence of the Concept of Will: A Critique of Classical Greek Moral Psychology”**

Jiang Lu

This article provide an analysis and comments on Prof. Nie Minli’s article “The Absence of the Concept of Will: A Critique of Classical Greek Moral Psychology.” Based on Nie’s argumentation, it examines his major claims, i. e. concerning the absence of will in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superiority of Kant’s concept of will, how the moral quality of man’s action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will, and how Ryle’s de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will is illegitimate. As an answer to Nie’s state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at is diagnosed as absent in ancient Greece by Dihle corresponds to the notion of *Willkür* in Kant rather than the notion of will. Kant attributes the goodness or badness of actions to *Willkür*, but not to the *Wille*. Kant faces also the problem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body, as pointed out by Ryle; therefore, instead of taking Ryle as an antagonist, the problems revealed by him help us understand why Kant restrict the influence of will to the realm of morality.

Theories of Causation: Upward and Downward Causation

Kui Yimi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upward causation and downward causation exist against th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f the exclusion of mental causation. Upward and downward causation are commonly regarded as indispensable to human epistemic and moral agency; and the exclusion of mental caus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ebated topics in current academia of philosophy of mind. Recently, Zhong Lei proposed a new viewpoint claimed that whether upward and downward causation exist or not depends on which theory of causation is used. This paper examine and criticize Zhong’s arguments and contend that within the framework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causal theories, upward causation always exists whereas downward causation always probably exists. These results shed light on the exclusion of the mental causation problem, especially on its parallelistic solution.